晚清经世文编的文化特色与文化本质

沈 艳

The compilation of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represen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enre of writing. The statecraft research that these works recorded actually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se compilations captured the intellectual dynamics of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自从魏源、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简称《贺编》)问世，尊其宗旨、仿其体例的续编之作赓续不绝，它们是：张鹏飞编《皇朝经世文编补》(1849年，以下简称《编补》)，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81年，以下简称《饶编》)，管窥居士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年)，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年，以下简称《葛编》)，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年，以下简称《盛编》)，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1897年，以下简称《陈编》)，求是斋主人辑《时务经世分类文编》(1897年)，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1897年，以下简称《新增时务续编》)，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年，以下简称《新编》)，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1901年)，宜今室编《皇朝经济文新编》(1901年)，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1901年)，阙名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亦名《增辑经世文统编》，1901年)，何良栋编《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年，以下简称《四编》)，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五编》(1902年)，储桂山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1902年，以下简称《续新编》)，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2年，以下简称《新编续集》)，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1902年，以下简称《于编》)，到1913年的《民国经世文编》为止，达20种之多。晚清到民国期间经世文编前后相续，直观地映现出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追求，上演了一曲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变奏曲。通过对这一经世文续编群宏观的文化透视，我们将能获取甚为丰富的文化信息。

一、经世文编的文化特色

经世文编代表了一种著录形式的创立，它发凡于明人陈卧子，中经清人陆燿调制，定型于清道光时的魏源。尽管自麦仲华《新编》出，多部续编已不再循《贺编》之旧例，但其宗旨形式、内容性质依然不出《贺编》之轨范。

（一）经世文编体的优长

经世文编体能够成为众多的经世人士表达经世观念的首选，自有其优长所在。除了具有鲜明的经世宗旨外，它还有以下显著特点：

其一，经世文编体例精善。它采用的是集录和辑例的结合体，即“裒录原书，留良去莠”①；“辑众人之所长”，“而萃为一编”②。这种体例能够“网罗一代之文献”③，使“精理名言交相荟萃，使留心研究不啻阅各类专书，然较专书尤有兴味，盖专书依次序述，篇幅甚长，易生厌倦，此则每论一事，必择精要之理，述以流畅之文，阅者趣味盎然，观念易得”④。

其二，经世文编搜罗美备。它取材各类官书和文集且不囿于作者的名气和文章的文学格式，故《贺编》成书时，有人“讥其杂录官书，有乖文体”。盛康批驳了此种论调，认为“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

格"⑤，所以文编选文以掌故为主，重事不重人，既有达官显贵之奏章，又有低官士子之论议，"凡经国体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柔远能迩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⑥其内容涉及传统经世之学的方方面面。在传播手段有限的情况下，经世文编不失为扩充见识的有效途径，因此，"自经世文出，而人始得所研究"，"寐处一庐，见闻有限，无以扩其智而充其识"的状况也大为改善。"于是相继而作者不一人，有续编、有三编，固谓造就人材，莫是为善。"⑦

其三，经世文编体注重选文的时效性，即所选之文以当代（本朝）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为主，且其言要能够有裨世用。这也就是自《明经世文编》以来所标举的"当今"与"实用"的原则，魏源在《贺编·五例》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两大主张：文编要展现当代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谓"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文编必须注重选文的功效与应变性，谓"盖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之节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之万变，宜各通其要，不得谓一可类推也。"由于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效性，因而经世文正续编才能在社会现实变幻无常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有着体例和内容上的优势，在报纸杂志等新的传媒不断涌现、各类专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经世文编体还是受到经世人士的重视。如，甘韩编辑《新增时务续编》之际，正值"中日有事以后，海内士大夫奋然而起研求当务之急……于是洋务西学之书日新月异、层见叠出"，"然求其搜罗美备、体例精善、简而能赅、详而不烦，则寥寥不可多得，学者憾之"，甘韩"有见于此，乃依经世文正续编体例"⑧，辑成一编。又如，梁启超于 1895 年准备编辑一部《经世文新编》时正是报纸大兴之际，而梁氏却认为新编"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⑨。由此可见经世文编体之受青睐的程度。

（二）经世文编负载的经世实学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经世文编专门辑录国家六政之建策、民瘼之救治、弊政之改革等有关奏章，以供朝廷治理国事之借鉴，成为当世政学要典，明末的《经世契要》、《皇明经世实用编》等就是这类政书的雏形。自从《贺编》确立这种政学要典的范例以来，其风气一直延续于民国时期。于宝轩在其《皇朝蓄艾文编·例言》中申明"兹编以济时为务，政详学略"，《民国经世文编》更是标榜其书"重政治"⑩、"以增进国民政治之常识，以为研究政法学之一助"⑪，由此而形成了一代政学集录群。明清政书的兴隆映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实用性"特质，中国传统文人学士从来不是单纯将书籍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是注重"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⑫的"资治"价值。因此晚清这批政学集录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

经世文编这种政学集录以政府施政为立场，特别重视君主与朝廷，以朝廷（即合法之政府）为权威。盛康在其续编的学术目"敬辑"圣学一卷置于卷首，以突出"帝王之学"，后续者多有继承，文编的政治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因为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建策均是围绕如何帮助朝廷更有效地实现政府职能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那些抨击专制政体的言论在经世文编里十分罕见。例如《贺编》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思想多有继承，但在其所收的 98 篇顾炎武之文中，多为治学、正人心、厚风俗方面的论说，而其反清复明与批判专制的言论则被摒弃不用；仅收的 4 篇黄宗羲之文，主要论及由博致精的治学方法、科举之弊及取士之道、风水鬼阴之谬等，其影响巨大的抨击专制的《明夷待访录》中的言论却未收只字片语。魏源的取舍与其维护君主与朝廷权威的立场大有干系。当然，专制政府的压制也会影响编者的取舍，如戊戌政变后，康梁的著作被清廷列为禁毁之列，故而 1902 年麦氏《新编》再版时康梁的文章被悉数删除，梁启超的序虽保留，其大名则被抹掉。对此也不可不察。

由于经世文编从朝廷施政的角度出发，故其内容的取舍与变化多与当政者的向背有关。例如，葛士濬在其续编文学目中增加算学等内容就与朝廷辟馆造就人材的举措有关，他将洋务分别列为卷帙乃缘于"往岁廷臣恭纂《穆庙实录》，亦闻洋务别为卷帙"。⑬又如，清政府

以新政相号召，使得以变法图强言论为主的续编之作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

正因为经世文编集经国体野之政于一编，所以它们是为官之人的辅助之书。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蔡侣笙即使穷极到摆测字摊之时也还看《经世文编》，只为有朝一日能再度出山，由此可见经世文编在世人心目中便是为官的必读之书。曾国藩为官之初十分注意研读《贺编》，他在日记中写道："经济之学吾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14]左宗棠早年也曾仔细阅读《贺编》，其所藏该编"丹黄殆遍"[15]。盛康在武昌任内以经世之学恒勖其子盛宣怀，"因举《贺编》以授。"[16]张之洞更是将《贺编》列入《书目答问》，建议士子阅读。他还为《于编》作序，称赞道："善化贺氏、武进盛氏文编，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若近出葛、陈诸本，体格寖新，亦仕学徵文之助。"可以说经世文编除了作为官员为政之助外，更是晚清士子从事科举之外的重要读本。经世文编所持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就是反对空虚无用的八股文而主张"士人当为有用之学"。饶玉成曾把《贺编》"缩为袖珍本以便舟车携随"，就因"此编关系世教，足为仕学模范"[17]。因而许多续编都是赶在秋闱之前出书，如《陈编》。当朝廷提倡实学将科举改试策论以及举行经济特科之后，弘扬经世实学的经世文续编更是仕途的良师益友，令士子"爱不忍释"。

综上所论，经世文编宣扬的经世之学究其本质而言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们真正关心的首先是学术对国家治理的有用性，即是否"足供朝廷敷布之资"，而不是学术的深入研究、理论的深层探讨，即"凡高之过深微"者"皆所勿取"。因此，经世文编的文化价值应置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考察才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经世文编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重大意义

梁启超于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他为诸生订立了十条学约，其中第九条是专门阐发"经世"的意旨："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记曰：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胡瑗）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18]梁氏此番切中肯綮之语至少透露了两层深意：(1)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应视为一种政学，其宗旨与实质相当于西方的政治学。笔者此前所论传扬传统经世实学的经世文续编应属政治文化范畴之意正与梁氏此深意相合，兹不再论。(2)传统经世之学作为治世的工具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变通。作为这种不断更新的经世之学的载体的经世文续编也体现了这一特性。兹详加论述。

（一）经世文编演变的内在思想动力——变易思想

任何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物，它本身就包含着足以引起变异的内在动力机制，这正是传统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原因。经世文编一续再续的内在的思想动力来自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变易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极富活力的思想资源之一，"六经之首"的《周易》对变易思想的阐述极具典型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9]；"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0]。这种"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成为历代有识之士倡导社会改革和思想观念变革的有力依据。

经世文续编的变迁与延续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此种变易趋向。张鹏飞在《编补·序》里指出酿成"明末群盗如毛、纵横中原，如过无人之墟"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帝"狃祖宗成例"而不知"穷变通久"，故他编补《贺编》就是为了"以资事功"、"有补于时是"，而不至于蹈明之覆辙。盛宣怀在其《续编·书后》里描述了当时"事变无穷极"的状

况，指出“理穷必变”，“以创千古未有之局”。盛康在《续编·例言》中表明：虽依《贺编》之例，但“法制损益，与时变通，有未可比同者”，故其编不拘成例多有变通之举。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后编辑的《民国经世文编》也是以传统的变易观来解释其书之出的必要性：“记曰：三王异制，不相袭礼。五帝殊尚，不相沿乐。盖时势有变迁，政局有递嬗，而经世之具亦月异而岁不同。”[21]

不仅经世文续编的编者多以变通的心态对待续编的编纂，而且为续编作序的有识之士也多从因革变通的角度来评判续编。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开篇便大力阐发中华元典中的变易思想：“《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之道，凡受命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有先与民变革焉。”经过反复论证，他得出结论：“开新者兴，守旧者灭。”他进而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论斥责了守旧之徒的陋识。梁氏透露，他曾“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只因无暇而作罢。而麦仲华的《新编》“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足以开守旧者之耳目”，故梁氏“喜麦君之书”。郑亦忱为甘韩《新编续集》作序称：“新编而有续集，求新不已之意也……因革损益在是，张弛变通在是。”邓邦述为该编作序也指出续集之出的内在动因：“夫时至今日，虽使周公孔子主持国是，亦不能深闭固拒、因陋就简，以驭其外；虽使尧舜禹稷复出而理天下，亦不能酣禧寝息无弦更张、因时通变，以动其内。”张謇为储桂山的《续新编》作序也开宗明义阐述了因革的意旨：“法积久则弊生……有易姓之因革，亦有子孙之因革。惟子孙之因革有二：一因弊初见而即变通者，小因革也；一因弊积久而变通者，大因革也。与其待弊积既久，老儒宿士硁硁然以为不可更易祖制藉口，何如随时因革之为愈乎？”进而他指出：“信如是，则经世之书转瞬即为旧物，欲补救当世之弊，亦非时作续貂之请不可”。张氏之言一语道破经世文编前后相续的内在动因。

诚然，晚清经世文编的前后赓续与社会危机的外在刺激大有干系，如《陈编》、甘韩的《新增时务续编》之出乃是甲午战败的刺激，续编体例内容的变迁也与西学西艺西政的大兴有关。但由上所述可知，晚清经世文编一续再续的内在的思想基础应溯源于中国传统的变易理论。

（二）贯串于经世文编的一条红线——传统与变革

韦政通先生在论及《贺编》的经世思想内涵时曾提出：“十七世纪以来的经世思想，可以说是在‘变’的意识中成长，而变革的思想则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虽然这些变革的思想，并未脱出‘基于传统的解答’的方式，但已为‘巨变’到来之前，提供了本土学术思想一个重要的‘基线’。”[22]韦先生此番切中要害的论述恰好点明了贯串于晚清各经世文续编的传统与变革的思想主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1．各续编的经世文表达的变革观

诚如韦先生所论，《贺编》的经世思想内涵里就已传达了改革积弊的意识。例如，该编中对恢复三代的井田与封建制的复古思想普遍表示怀疑，对“当世之务”（漕、盐、河工等实政）的种种积弊的变革已成中心议题。其中尤以张履祥在《备忘录论治》中所论最具代表性，他提出：“田制必当变”、“学校必当变”、“科举必当变”、“铨法必当变”、“官制必当变”、“资格必当变”、“军政必当变”、“赋法必当变”、“衙役必当变”。张氏之言虽是针对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而言，但表现出强烈的改革现行政体的意识。魏源选中此文，应是为其变革思想所打动。[23]

但《贺编》以及《编补》、《饶编》所载，主要还是当时的各级官吏兴利除弊一类的改革主张。而从《葛编》开始，变革的主旨逐渐深化，这可由其所收之经世文的变化看出，《葛编》之前的选文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的论治之奏疏、文章，而《葛编》之后的选文来源就更多样化，除了各级官员为政之奏章，更有走在朝代之前的洋务思想家、维新派的议论时政之作，它们均以变法图强相号召，特别是《陈编》以后，所收的无论是当权大臣还是文化精英之文多切中变法自强这一时代最强音。如洋务时期的《葛编》、《盛编》除

注重选取洋务大吏的奏疏外，也大量收录思想家冯桂芬的时文，《葛编》40 篇、《盛编》34 篇，它们基本上选自《校邠庐抗议》。冯氏在《收贫民议》(《葛编》卷27) 中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又在《变科举议》(《盛编》卷66) 中提出“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两编所收的冯文都是针对所揭露的时弊提出的改革建议，涉及吏治、田赋、水利、农桑等。两编还收入了薛福成的早期变法议论，薛氏在《变法》(《葛编》卷13) 中提出了一种“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的社会发展论，根据这一理论，他强调必须变法以赶超西方。《葛编》、《盛编》所选当是洋务时期思想精英变革主张的代表。甲午战后，朝野上下无不思变，这在维新时期的《陈编》、《新编》中有典型反映。《陈编》收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之文 57 篇，郑氏在《条约》(《陈编》卷40) 中呼吁：“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为修改，以保利源。”封疆大吏和高级官员也纷纷呼请变法，如顺天府尹胡燏棻在《变法自强疏》(《陈编》卷16、《新编》卷1) 一文中沉痛地指出“事变一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计，窃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故他呼吁皇上变法：“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新疆巡抚陶模的《培养人才疏》(《新编》卷1) 提出变法建议 13 条，如汰冗员、停捐例、破除旗兵积习、废武举等。以上是朝廷重臣中求变心态的典型，更不用说维新志士康梁之求变之切了。新政期间，朝廷标榜变法，全国上下充斥着变法之言，但其所论大多不超出前此各时期有识之士所言之外，这在新政时期出版的多部续编中有鲜明的反映，即这一时期的续编所选的有关变法的文章亦大多来自前续各编。

如果说一位编者的选择还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多位编者的同一选择应多少具有共性，以上所举之经世文均为多部续编所选，如果除开重复雷同的因素，求变的共同致思主旨当是左右这一重复选择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变”基本上是近代转型社会的主议题，但变来变去还是脱不出“基于传统的解答”的方式。“变”总是与“不变”如一双胞胎共同孕育于传统的母体之中。《周易》除重视“变易”外也注重秩序的“不易”观念，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类。薛福成的《变法》(《葛编》卷13) 在论证变易为时势所推动之理的同时，还是坚持“变器不变道”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说，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也主张“中，体也，所谓不易也，圣之经也”(《陈编》卷3《盛世危言自叙》)。总的来说，贯穿于《葛编》以后各续编的变通自强观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是主张缓进而反对骤进，最终陷入“变”与“不变”的二律背反中。对此我们亦不能不察。

2. 各续编中经世之学的变迁

传统经世实学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即经世的目的是要求达到致用的功效，“致用”乃“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③，就是要解决国家困难、为人民造福祉。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经世之学的工具性，因而时代不断变迁，经世之学亦要相应随时更新以使之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贺编》以后的各续编所传播的经世之学便构成了因时而变的序列，显现了强烈的现实性。《贺编》出于鸦片战争之前，其所载之经世之学以传统社会的六政——涉及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实政治理之学为主体，兼及通经致用的学理和传统政体的贯彻与完善的探讨。可以说，《贺编》的经世之学纯粹是孕育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从《饶编》到《葛编》、《盛编》，其经世之学逐渐引入洋务之学，主张学习西方之长技。这些续编大量收录洋务大吏、洋务思想家之文，其中有的在选文上倾向洋务之文，有的则在体例上作出调整，如《葛编》专辟洋务一纲，将《贺编》适宜传统经世之学的体例调和为可容纳洋务的经世之学，表明了经世之学向洋务延伸的趋向。这一时期的续编的洋务论说主要以介绍西方各国的风土人情、西方的船坚炮利、西洋历算学等为主。而维新变法和新政时期的各续编的经世之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延伸，《陈编》以“师泰西治法”号召经世之士；《新编》以学习日本、泰西实行“新民新国”之政激发经世之士的参政热忱；《皇朝经济文编》、《续新编》则设西政一门，专述泰西各国政情；《四编》在

礼政门专辟议院目，讨论设置议院事宜。张謇认为《续新编》虽反映了“近数年风气”之变，但还缺少“国民自由平等之风潮与夫宪法行政哲学之方针”㉕。可见在张氏心目中，西方宪法行政之学亦是经世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上可见传统经世之学向西政之学延伸的趋向。

纵观各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的演进，西学色彩日益浓厚。但就其流变的内在学术理路而言，它们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基本上，传统的中学仍是经世文续编的主体，而西学只是处于被经世文续编借用的地位。陈邦瑞在《四编·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方今国家讲求实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中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此语当是针对《四编》之前的各续编而言，它从侧面说明经世文编遵循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故而广受传统士人的欢迎。如果借用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的比喻，经世文编的演变实际上是用“新布补旧裤”或“旧瓶装新酒”。与西方近代观念相比，经世文编负载的传统的经世观念，总是多含有“道德理性”的成分，讲究价值和目的，同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的西方近代“工具理性”，颇有间隔。因此致用的范围也就出不去大格。但“新酒”或“新布”即新的力量“在一方面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或是通过自己建立的新机构，或是通过它们为了实现它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老机构；它们一面很顺利地流泻到这些沟渠里来，一面也就促进了社会的变革”。㉖原有的体制一旦阻碍了新力量的发展，新力量就会冲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民国经世文编》就是新力量冲破旧体制后的新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布”、“新酒”还是达到了客观的实际效果。

---

①宋育仁：《皇朝蓄艾文编·序》。
②③汤寿潜：《民国经世文编·序》。
④⑩《民国经世文编·例言》。
⑤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
⑥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
⑦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序》。
⑧蘅华馆逸史：《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序》。
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 48。
⑪㉑《民国经世文编·叙言》。
⑫《隋书·经籍志·总序》。
⑬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
⑭《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印行。
⑮《左文襄公年谱》卷一。
⑯盛宣怀：《皇朝经世文续编·书后》。
⑰《皇朝经世文编·重校本叙》。
⑱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文集（二），页 28，（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⑲《易·系辞下》。
⑳《易·系辞上》。
㉒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页 70，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1 年 9 月。
㉓参见韦政通前揭书之第二章。
㉔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
㉕张謇：《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序》。
㉖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页 65。

（作者沈艳：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教师；邮编 430062）。

CONTENTS

1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S AND LAW

7 Zheng Yonghua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during the Years Leading to the 1911 Revolution

14 Chi Yunfei The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Officials Advocating Establishment of a Co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23 Zhao Xiaohua The Problem of Long – pending Legal Cases in the Late Qing

SOCIETY AND ECONOMY

32 Zhang Xiaoye The Problem of Anti – smuggling in the Qing Salt Administration

42 Tong Yonggong A Brief Commentary 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hengjing Ginseng Monopoly

50 Xu Hao The Management of Extensive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EARNING AND CULTURE

61 Tian Hanyu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Zhuang Cunyu' s *Correct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zhengci)

69 Shen Yan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Qing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RESEARCH ON POPULATION

75 Wang Weiping Foundling Homes in Jiangnan in the Qing Dynasty

86 Han Guanghu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ner Garrison at the Yuanming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its Population

RESEARCH NOTES

91 Lü Xiaoxian Three Problems Regarding Qing Official Residences Paper (Di Bao)

97 Xi Yuan Narrative of Wang Cong' er Rebellion

BOOK REVIEWS AND TRENDS

105 Reviews 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18*th century*.

110 Zhu Hu Ghosts of Great Times —— a Review of P. Kuhn' s *Soul – stealers*

113 Ho Ping – 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 s Re – envisioning the Qing (Part One)

121 Liu Zhonghua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Qing Edition* (Qing Tonjian)

124 Xu Danliang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